

以文学连接世界

——《潘耀明研究文集》总序

作者：朴宰雨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
韩国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
韩国世界华文文学协会会长

文学史终究不只属于作家，也属于那些成就作家的人。

一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不只是因为诞生了伟大的作品，更因为总有一些人，在漫长岁月里默默守护文学的火种。他们或许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却长年守护刊物，推动出版，联系作家，组织交流，使文学得以跨越地域，跨越世代，在不同文化与不同人生经验之间持续流动、生长与传承。

真正成熟的文学生态，不只是创作成果的积累，更是文化建设的成果；不只是作品的历史，更是无数文化工作者共同耕耘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潘耀明先生的价值，从来不应只以一位作家、一位评论家或一位出版人的成就来衡量，而应放在香港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宏大脉络中重新认识。

近百年来，香港凭借其特殊的地理历史际遇与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逐渐成为世界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交流枢纽。从“南来作家”开创的新文学景观，到《明报月刊》等文化刊物的长期深耕；从曾敏之、刘以鬯、金庸、董桥等文化人的薪火相传，到香港与中国内地、台湾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交流网络的不断拓展，香港文学始终不是封闭的地域文学，而是在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与融合之中，逐步形成兼具本土精神与世界视野的文化品格。

《明报月刊》数十年来始终守护自由、人文与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早已超越一般文化刊物的意义，而成为世界华文文化共同珍视的一座精神灯塔。白先勇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明报月刊》是一座自由的灯塔，往往在寒冬深夜放射着明亮的光芒。”而继承金庸，数十年来默默守护这座灯塔的人，正是潘耀明先生。这一评价，也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在香港文化史与世界华文文学史上的特殊位置。

潘耀明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成长，并以半个多世纪的坚守，成为香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建设者之一。

纵观香港文学发展史，同时兼具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与文化组织者四重身份，并能数十年如一日活跃于文学现场，持续推动香港、中国内地、台湾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交流的人物，实属凤毛麟角。

然而，比起他耀眼文化履历，更让我感佩至深的，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人格力量与精神风骨。

高炉饼香

范惠玲

闽北建瓯的市井巷陌，烟火温软，一枚传承四百年的高炉光饼，藏着古城最醇厚的非遗韵味，也沉淀着一代代建瓯人的故乡记忆。这道古朴风味缘起明代抗倭岁月，是戚继光将士随军征战的便携干粮。饼身正中精巧的圆孔，原为穿绳悬挂、方便行军所设，方寸间饼之间，镌刻着先辈护境安民的家国大义，历经岁月洗礼，渐渐褪去战时锋芒，化作建瓯岁岁不息的寻常烟火。

地道的建瓯高炉光饼，历来有“金面、银边、铁底、棉花心”的古法品相准则。匠人格守传统技艺，以陶缸高炉为器，木炭明火慢烤，方成一味正宗。炙烤成型的光饼，饼面金黄莹润，饼边凝着素雅乳白，紧贴炉壁的饼底紧实酥脆，内里面团经老面自然发酵，蓬松暄软，肌理细腻。这份质朴风味，无需繁复佐料加持，仅凭纯粹麦香与温润炭火香相融相生，滋味清简绵长，是古法手艺独有的温润气韵。

年少时光里，光饼是镌刻在春日秋游里的独家暖意。每逢学校踏青出游，母亲总会备好半斤光饼，作为我的午餐。彼时物资匮乏，粮票弥足珍贵，人们大多以大米搭配少许现金兑换光饼。依稀记得，半斤大米加五分钱，便可换得五枚光饼。彼时同学出游，书包里大多藏着这一味家常美味，就着清水细嚼，面饼绵软柔韧、麦香清醇，朴素的美食，却装点了整个年少春秋。

计划经济年代，物资

紧缺、肉票稀缺，市面仅有原味光饼，无任何花式品类。直至改革开放后，市井烟火愈发繁盛，建瓯街头的光饼铺才渐渐推出口味丰富的肉饼、芝麻光饼，让这道百年老味有了更多层次与新意。

建瓯的清晨，总被高炉袅袅烟火温柔唤醒。揉面、塑形、打孔、贴炉，匠人手底的每一道工序都沿袭古法、娴熟沉稳，日复一日的坚守，让老手艺在烟火传承中生生不息。新鲜出炉的光饼风味最是绝佳，外皮酥脆有声，内里松软带韧。原味光饼咸淡相宜、回甘悠长，肉馅光饼油润鲜香、醇厚入味。其食法随性百搭，空口细品可尝本真麦香，夹以卤肉、笋干、腌菜，便是最地道的闽北市井风味，藏着古城最朴素的人间烟火。

世事变迁，建瓯街巷的高炉烟火岁岁绵延，光饼的传世醇香始终未改。褪去古时军粮的历史功用，这枚小小的面饼，已然成为建瓯古城鲜活的味觉图腾，扎根乡土烟火，融入寻常岁月。

如今，不少饼铺以电炉烘烤替代传统木炭高炉，褪去了烟火缭绕，制作过程更为洁净便捷，却始终恪守古法配比与发酵工艺，完好留存了光饼原汁原味的醇厚鲜香。

一枚小小的建瓯光饼，

烤的是人间寻常烟火，承的是古城千年温情。它浸润着建瓯的岁月肌理，承载着匠人的坚守传承，更是每一位羁旅在外的建瓯游子，心底最温柔、最难忘的故乡念想。

多重要的作家、学者与出版文化界朋友，从而更加深入地走近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

对我而言，这不只是珍贵的人生机缘，更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与文化格局。回望自己的学术道路，我愈来愈深切地感到，鲁迅研究、香港文学研究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并不是彼此孤立的领域，而是在不同阶段逐渐交汇、相互映照，共同形成了我今天的学术视野。耀明先生，正是这一学术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位同行者。他带给我的，不只是友情与合作，更是一种文化视野上的开拓与精神上的启发。

正因如此，二〇一九年四月，我联合多所高校及学术机构，在首尔与济州举办“潘耀明文学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首次从“文学事业”的整体视野，系统梳理潘耀明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实践。陈思和教授对此感慨地说：“由远在首尔的韩国世界华文文学协会来发起举办，这让我既感动又惭愧。”这句话令我久久难忘。它不仅是对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肯定，更是对潘耀明先生数十年默默耕耘文化事业的一份深切致敬。

《潘耀明研究文集》正是在此次国际学术研讨的基础上，经补充、修订而成。它既是对潘耀明先生文学事业的一次系统梳理，也是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交流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本套文集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潘耀明研究论集》，收录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陆士清、陈思和、王润华、黄维樑、王列耀、白舒荣、杨剑龙、喻大翔、白杨、周立民等学者，分别从散文创作、编辑出版、香港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及文化传播等不同层面，对潘耀明先生的文学实践作出深入探讨。虽然研究视角各有不同，但共同指向一个重要结论：潘耀明先生的历史地位，不应局限于作家或编辑家的单一身份，而应从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加以理解。他的文学事业，不仅属于个人的创作历程，更是香港文学生态建设与世界华文文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卷《我与潘耀明》，则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一位文化人的精神风貌。如果说，上卷更多呈现的是潘耀明先生作为文化建设者的历史贡献，那么下卷所

保存的，则是一位文化人的人格风范与生命情怀。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日本、东南亚、欧美等地的作家、学者和友人，以真挚的文字追忆彼此交往的岁月。陈若曦称其为“最大的文学活动家”，尤今赞其人生“斑斓”，戴小华称他“用深情拥抱文化”，杨际岚誉之为“文侠”。这些不同的评价，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事实：潘耀明先生留给人们最深刻的，不只是他的著作，更是他的胸襟、人格，以及他以文学凝聚友谊、以文化连接世界的精神。

多年来，我也常常阅读耀明先生的散文、评论与文化随笔。他的文字很少刻意铺陈情感，却总能在平实真挚的叙述之中，流露出对人格、风骨与知识分子精神的珍惜。我始终认为，一位真正的文化人，最终留给世人的，不只是思想与著作，更是可以温暖他人、感召后人的精神品格。耀明先生的文字如此，他的人格与人生亦复如此。

今天，当世界华文文学愈益重视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我们重新回望潘耀明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文学道路，便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真正建构的，不只是若干刊物、丛书或一次次国际会议。他所建构的，是一种开放、包容、合作、共享的文化精神；是一个跨越香港、中国内地、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华文作家的文化共同体。

因此，《潘耀明研究文集》的出版，不只是向一位文化人致敬，更是在保存一段值得珍视的香港文学史，一段世界华文文学交流史，也保存了一代华文文化人共同守护文学理想、推动文化对话的集体记忆。

值此付梓之际，谨向香港三联书店致以诚挚谢忱。多年来，三联书店秉持深厚的人文出版传统，为香港文学、中华文化及世界华文文学的整理、保存与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也衷心希望，本书不仅成为向潘耀明先生文学事业致敬的一部著作，更能成为后来者理解香港文学、认识世界华文文学的一座桥梁。因为真正能够跨越地域、跨越文化、跨越时代的，终究不只是作品，更是一位文化人的精神、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怀，以及一生始终如一的人文信念。

因为潘耀明先生不只是连接了文学世界。他本身，就是一座桥。是为序。

一只储钱罐

吴巧雯

偶然间翻出一箱旧物，仿佛不经意间打开了时光的宝盒。一只铁制的储钱罐，就这样悄然映入眼帘。

它是两颗爱心紧靠的造型，绘有米奇的可爱图案，设有锁扣，只是搭扣早已脱落。即便再怎么小心收藏，岁月还是让它生出了些许斑驳的锈迹，只是附在其上的往事，此刻缓缓铺展开来。

这是父母给我买的礼物。虽已记不清最初获赠的具体缘由，但它的意义却随时间愈发深刻。起初，我对这个铁盒子并未生出多少偏爱，随手搁置在角落。直到后来，爸爸忍不住把它拿出来，在我面前晃了晃，笑着说：“听，这肚子饿得响也响不了，正等着主人喂饭！”

自那以后，每当我取得进步或是帮忙做家务时，爸妈总会奖励几枚硬币，并不忘笑着提醒：“该给储钱罐‘喂饭’啦。”

为了这声“喂饭”，我开始像兑换积分般，认真地读书，积极帮做家务。有一回，听见回收废品的大叔在街上念叨：“两个矿泉水瓶一毛钱，一个易拉罐一毛钱……”我灵机一动：晨跑的码头边，不总散落不少空瓶子吗？捡回来卖，不就能赚“饭钱”了？于是，每次晨跑回家时总拎着满满一大袋战利品。

一有硬币，我便欢天喜地赶紧投进去。到了夜晚，我将它们哗啦啦地倒出来，银色的一元、金色的五角，在夜色与灯光下亮闪闪。那一刻，我仿佛是在清点自己亲手收集的满天星辰。

村里每年都有普度日，总会迎来一群流浪者挨家挨户乞讨。每到我家门前，爸爸总会拿出提前备好的零钱，分给每个人。邻居们见状，总笑他傻，可爸爸只是温和地笑笑，年复一年，从未间断。有一次，他蹲下身，同我极认真地说：“孩子，我们要做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似懂非懂，却默默拿出储钱罐里的硬币，学着爸爸的模样，将它们分给那些在风雨中跋涉的人。

到了晚上，眼见罐子里的“星星”一下子少了许多，我心里有些情绪，爸爸却摸着我的头，夸我做得好。他指着储钱罐上的口子说：“你看，这道缝是要我们学会让善意流露出去。星星只有挂在天上，才能闪着光啊。”那时的我，仍会因为硬币的减少而暗自伤心，无法完全参透其中的深意，但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深深印在心上。

如今，这只锈迹斑斑的铁盒，封存的是比硬币更珍贵的岁月。那道磨损的投币口，无声地教会我：给予远比囤积更让人快乐。爸爸当年的言行，也早已在我的成长里生根发芽。

湖头芋包

苏太阳

处暑刚过，湖头的风还黏着没散的暑气，田埂边的芋头叶已经悄悄黄了边。这时候往镇上走，不用特意查攻略，顺着青石板路钻进老巷，闻到混着红葱头和虾干的咸香，就知道巷子里的芋包刚好出笼。

湖头人做芋包，全是实打实的笨功夫。外皮不用面粉，就用白米和当季刚挖的水芋，按一比一的比例配好，泡够了时辰，推着石磨一圈圈磨成细浆。磨出来的浆带着芋头天然的淡紫色，稠得能挂在勺边。我见过镇上阿婆磨浆，手腕上青筋凸着，推磨的节奏稳得像老钟摆，她说浆磨得不够细，蒸出来的皮发糙，吃着卡嗓子。

芋包的魂全在馅里，土猪肉要选前腿肉，带点肥才香，切成小丁，配着脆生生的马蹄、泡发好的虾干，再加大把红葱头，热锅里一爆，香味“轰”地就窜出来，直往鼻子里钻，勾得人肚子直叫。

蒸芋包得用竹编蒸笼，底下垫着湿纱布。阿婆舀一勺糯米浆铺在底，挑一筷子馅搁中间，再盖上一层浆，动作不快但稳得很，像给什么宝贝盖被子一样。文火慢蒸二十分钟，竹盖子一掀，白茫茫的热气“呼”地涌出来，一个个白白嫩嫩、中间鼓着的小团子就露了脸。

刚出笼的芋包烫得很，得左右手来回倒腾着拿。咬一口，外皮软乎乎的几乎要化在舌尖，带着水芋特有的清甜；内馅的咸鲜瞬间在嘴里散开，马蹄的脆、虾干的鲜、肉丁的油润，一层叠着一层。要是再蘸点本地带点甜的辣酱，那滋味，真是没话说。

在湖头，芋包可不只是吃食。中秋前后，家家户户都蒸芋包，蒸好了装在竹篮子里，给左邻右舍送几个。闽南人不善表达，送过去还要故意“嫌弃”两句：“哎呀，这次肉放少了，将就吃啊。”收的人也不客气，笑着接下，回头再给人送自家做的咸笋包。这来来回回的“嫌弃”里，藏的就是闽南人最实在的人情味。

我有个朋友在厦门工作，每次回湖头老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巷口买两笼芋包，也不管烫不烫，站在路边就往嘴里塞。他说，在外面吃再多山珍海味，都不如这一口烫嘴的芋包来得踏实。

其实哪是什么芋包踏实啊，是这口味道里，藏着回得去的旧时光。



父亲的老木犁

李思华

山村、田野，喘着粗气的老牛，翻飞的泥花，还有头戴竹笠、手抚犁把，被汗水浸透衣背的父亲。这一幅画面，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里，挥之不去。“嗨！”父亲犁地时断断续续地吆喝，许多年以后，依然在我的记忆深处响起。

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对土地、耕牛、木犁心怀深厚的情感。家里墙上挂着的木犁，已有些年份，木纹沧桑，犁铧锋利，犁把被父亲的掌心磨得乌亮。

无论春夏秋冬，农田开播前，父亲都会从墙上扛下木犁，细细地擦拭，仿佛遇着久别的老朋友，说着悄悄话。每当犁完农田后，父亲总是把犁铧上的泥土清洗得干干净净，放在阳光下晒干，又挂回在不易受潮的墙上。

母亲曾说父亲把木犁视作家里不会说话的儿女，父亲笑了笑：“耕牛、木犁都是家里的功臣，看着木犁，心里踏实！”是的，正是耕牛和木犁帮着父亲，在土地里播种着父亲养家糊口的希望，也播种着农家孩子的诗和远方。

记得我八岁那年，暑假的一天下午，太阳毒辣辣地照着，天热得不见一丝风，除了树上的知了嘶哑着吼着劲歌，那些平时活灵活现、四处觅食的小家禽，远远地躲在树荫里，昏昏欲睡。父亲在离家两公里远的山脚犁田，母亲让我送去点心。没想到点心还没送达，天空乌云发怒，被抽赶一样翻卷着，雷声一阵高过一阵。我加快步子赶到田里，只见父亲扬着细竹棍，吆喝着，不时用手掌抹着脸上的汗水，伴随着木犁的滑动，层层土花翻飞着。

我心疼地喊着：“阿爸，快来吃点心！”父亲解下牛轭，让牛抽空吃点草，填下肚子。父亲刚吃完点心，狂风裹着骤雨，劈头盖脸而来，电闪雷鸣，山上树木呼呼作响。父亲穿上蓑衣，一把把我拉进蓑衣里，我依偎着父亲，紧握着父亲结实粗糙的手：“阿爸，雨这么大，咱回家吧？”“华儿，不急，西北雨来得急去也急，再说这牛是各家轮流用的，别怕！”说罢，父亲掖了掖蓑衣，紧紧握住我的小手，这时风雨更大了。蓑衣外，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蓑衣内，是父亲温暖厚实的手。

我就读初一时，周末、寒暑假和放学以后的业余时间，放牛的活儿便落在了我的身上。一天上午，父亲用扁担一头挑着木犁，一头挑着稻草，牵着老牛去地瓜地里犁田和烧草木灰土粪。我放学一回家，书包一扔，忘了戴草帽，急急忙忙赶到地瓜地里。父亲已犁好地，坐在田埂上，吸溜着喇叭形旱烟，木犁洗得干干净净，搁在田沟里。草木灰土堆上，轻烟袅袅，地瓜地里，氤氲着稻草的清香味儿。“来，华儿，你最爱吃的烤地瓜！”父亲拿着小竹棍，从草木灰里拨拉出几个烤熟了的小地瓜：“犁地时捡剩的，趁热吃。”说罢，父亲脱下竹笠，戴在了我的头上，扛着木犁，转身踏上回家的小路。

我牵着牛绳，吃着香喷喷的烤地瓜，望着父亲扛着木犁远去的背影，一种比烤地瓜更加香甜的味道，弥漫在我的旧时光里。

而今，父亲走了。父亲的老木犁，闲搁在破旧的祖屋里，静静地叙说着父亲的故事。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怀念曾经的如山如水的父爱。